

出版与文化政治：清末出版的生殖医学书籍及其读者

张 仲民（复旦大学历史系）

摘要：在晚清中国，当时的知识精英生产了大量的种族论述，以激励中国人强种、爱国。清末文化市场上出版的生殖医学书籍也自觉承担了类似功能，不过却少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些书籍及其读者的情况。实际上，这些书籍的内容与出版广告大都将自己的著译、出版目的同种族、国家联系起来，以来自西方（包括日本）的“科学”知识作为依据，注重改良传种、“优生优育”的实行方法。可以说，这些书籍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涵义，既昭示着近代中国人急于强国、强种的集体心态，也昭示当时出版和文化政治的勾连情形。这些书籍的出版情况如何？内容怎样？当时的读者是如何看待与阅读这些书籍？其出版意义何在？同样值得我们去探究。

关键词：书籍广告、强种、生殖医学书籍、读者、文化政治

一 导言

晚清以降，中西竞争剧烈，外国人关于中国人身体衰弱、种族腐败的描述亦影响了中国人对于自身的见解和想像，“‘支那病夫’、‘支那劣种’，殆将成为各国固有之名词。此虽外族痛诋之言，然以吾族现在之形式与天演之公例相证实，亦未见其过也。”¹也如严复之言：“中国者，固病夫也。”²类似的“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表述在当时趋新知识界非常盛行，反躬自省、自我批判之余，晚清知识精英如严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利用舶来的西方种族知识，杂以传统知识资源中的相关见解，提倡尚武精神，来唤醒和强化人们关于身体衰弱、种族衰败的现实刺激，激励国人知耻而后勇，以与列强竞争。一时之间，主张强种的表达颇有论述的“嘉年华会”（carnival）之势：“今中国士夫，动曰强种。”³如何强种以与列强竞争，成为盘旋于晚清知识界上空历久弥新的话题。

其实，像这样的以达尔文主义（Darwinism）为理据的表述，在今天看来都是缺乏“科学”依据的，甚至充满严重的种族偏见与种族歧视色彩，可在晚清却得到很多人

1 《国民卫生学》，《湖北学生界》第5期（光绪二十九年五月朔日[1903年5月27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68年影印本，第671页。

2 严复：《原强》，收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页。

3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页。

的响应,成为当时人对抗西方列强及激励自身崛起的文化武器。或如沙培德(Peter Zarrow)教授所言,种族论述在建构近代中国人的认同方面、在对世界形成“科学”的理解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⁴

不过,几乎以往所有探讨近代中国人优生学、种族观念的著述,都没有很好利用清末文化市场上出版的这些生殖医学书籍;其他研究性文化史、身体史、医疗史、卫生史、生理学史的著作也几乎没有注意到清末出版的这些书籍。只有个别研究者从性学史角度曾予以涉及击。⁵实际上,这些生殖医学书籍同样也参与了清季强种与建构民族国家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它们大都将自己的著译、出版目的同种族、国家联系起来,宣称自己的终极关怀在于改良传种、“优生优育”,使中国人文弱的身体得到改善,以在与西方人、日本人的竞争中胜出。可以说,这些书籍是近代中国身体、种族与优生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想迫切强国、强种的焦虑心态,也展现了出版、商业、文化与种族、国家、政治间的复杂互动。这些书籍的出版情况如何?内容如何?当时人是如何看待与阅读这些书籍?其出版意义何在?同样值得研究者对之进行“厚描”(thick description)。下面我们首先从这些书籍在报刊上刊登的广告说起。

二 生殖医学书籍的出版概况

广告收入是报章杂志正常运作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晚清报章杂志上存在浩如烟海的书籍广告,所谓“近来报纸流行每出一书,长篇广告,烂然满目。”⁶借用一个不好听但也许很贴切的比喻,书籍广告就是一个“皮条客”,是书籍作者、印刷者、销售商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新出书籍,非广登启事,购者无从知悉。”⁷书籍广告不仅能引导读者购买书籍,还能建构读者,刺激或创造读者的阅读欲望,使读者的阅读兴趣、阅读表达服从于商业出版与“文化政治”的需要。若对这些书籍广告充分利用,我们不但可以管窥文化市场的变化与读者的购阅趣味,还可以揭示当时的出版心态和社会风气。

4 Peter Zarrow, "Liang Qichao and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Race' in Late Qing China,"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2期(2006年6月), p. 158。

5 参看闵杰:《性学禁区初破》,见刘志琴主编、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265页;李仁渊:《新式出版业与知识分子:以包天笑的早期生涯为例》,《思与言》第四十三卷第三期(2005年9月),第88—89页。李仁渊的《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版)里亦曾涉及,但所谈内容与《新式出版业与知识分子:以包天笑的早期生涯为例》基本相同。惟以上三著志不在此,材料利用不够,所谈太过简略,也没有从种族角度考虑。另外,研究性学的刘达临的《20世纪中国性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冯客(Frank Dikötter)的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University, 1995)则根本没有注意到清末书籍市场上的此类书籍,樊友平等主编的《中华性学观止》(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也没有收录此类书籍。

6 孙毓修:《图书馆》,《教育杂志》第12期(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10年1月6日])。

7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20世纪初,文化市场上这类生殖医学书籍大约在1901年开始出现在上海的文化市场上,这通过它们的书籍广告可以得知。如在1901年6月25日的《中外日报》上,“上海一马路第一楼后理文轩中外书会”曾刊出书目广告,该广告列举有诸如《各国五彩地图》、《英文东文读本》及各种实学书目,还包括《太上感应篇》等善书和一些字典;最重要的,里面有些关于生殖医学的书目,这也是笔者发现的最早关于此类书的广告。其中云:《生植器新书》(原文如此)一元五角,《普通妊娠论附小儿养育法》一元三角,《通俗造化机论》六角,《男女交合机论》五角,《无上之快乐》四角,《男女交合新论》五角,《男女造化机论》七角,《男女交合秘诀》五角。从上述这些书名,除《通俗造化机论》不能确定其是否与性和生殖有关,其余各书都应该和生殖及性有关。另外,笔者看到的最先有内容简介的生殖医学书籍广告也刊载在《中外日报》上:

新译东洋原本《戒淫养身男女种子交合新论》:是书专门考验养身秘法,莫当淫词误观。读者不但益于胎产,且能延寿长生。故译成华文,半为劝世,以供众览。定价八角。托上海四马路第一楼后理文轩书会、三马路朝宗坊口日清书馆,香港、新加坡均有代售。美国法乌罗、日本神田彦太郎。⁸

从这些生殖医学书籍的广告词采取的修辞策略和叙述方式来看,这些书籍广告大都宣称其内容在于讨论卫生学理,特别是优生原理,有利于强种与卫生事业,属于人人都应该阅读的常识性书籍。如《新民丛报》第6号上刊出的翻译自日本的书籍《胎内教育》广告词:

中国古有胎教之义,但不过空谈。近世学理日明,此事乃可以实践。此书发明人身生生之理,形魂相感之说,以为进种改良之第一着。手(似应为首)为人父母者不可不家置一编也。欲为一家求亢宗之子弟,不可不读此书;欲为一国养善良之国民,不可不读此书。

《大陆报》上刊载的翻译书籍《妊娠论》一书广告词亦如是标榜:

欲组织文明之国,先制造文明之种,欲制造文明之种,先研究制造文明之种之方,此《妊娠论》一书所以不可不急公诸世也。是书主脑在妊娠,内容之发挥,不言而喻,然其特色则在考验确凿,辨精语微,较之坊间所售之《生殖器》、《育儿法》诸书,殆有天渊之隔,诚青年界所必读之要籍也。夫传种一事,本动物之天职,而为人类对于社会之义务。处种竞之世界,而不强其种,能逃天演之淘汰乎?今外人骂支那人曰野蛮种,使支那人而不甘野蛮也,则他日支那文明当以是书出版之日为一大纪念。⁹

不止这些翻译的生殖医学书籍如此宣传,中国人根据有关卫生知识写成的生殖医学书籍亦不外如是。如《吾妻镜》一书的广告词所言:

是书海门大思想家杨凌霄先生所著,细讲夫妇合欢失欢之理,子女贤不肖之由,及得胎、避胎、保胎之术并养育之方。欲我黄种转弱为强,变其昏伪浮

8 《中外日报》1901年7月1日,论前广告第二版。

9 《大陆报》第1期,十一月初十日(1902年12月9日),插页广告。

佻之气。……¹⁰

更进一步，我们从有的书籍广告词中还可以得知此书的大致内容。如 1909 年 8 月 10 日《神州日报》上“家庭必备《育儿全书》”的广告词，就把该书的讨论的大概内容与适用对象作了介绍：

世俗妇人多患小产与早产，产儿又每苦疾病与夭殇，甚有分娩十余次而卒无后者，皆(不明育儿法)所致也。本书详论婚姻选择法、妊妇养生法、产妇养生法、分娩处置法、初生儿处置法、哺乳法、离乳法、人乳养法、牛乳养法、双乳养法、离乳后养法、乳妇养生法、乳母选择法、牛乳检查法、健儿保护法、精神教育法、病儿看护法，以及小儿常发诸病预防法、治疗法，无不毕载，而于我国恶习尤力加矫正，以图改良。不但为医生、医学生、女学堂、保姆学堂、产婆学堂之师生所必需，凡欲子孙繁殖者，不可不家置一编也。定价大洋六角。

这类生殖医学书籍为晓畅明白、吸引读者起见，一般都附有插图，这从其广告词中也可看出来。¹¹如“二十世纪新著述——《最新胎产研究书》”的广告词：

本书为留学日本医学专科毕业生郭德裕所著，就胎儿发展之起源，以迄分娩之结果，专以二十世纪之新学理说明其状况，并附图三十余幅。无微不显，无理不达。虽愚夫愚妇，亦可与知。俾不能生育与苦于生育者得明晰其理由，以破除从来宗教上之迷信。¹²

除掉上述这些以出售为目的的书籍广告外，还有个别赠送书出版，当然这类赠书的目的是在自己的药物作广告，但在客观上无疑也是有利于这类生殖医学知识的传播。如笔者在《时报》上即曾看出这样的书籍广告——“《妇人卫生书》不取分文奉送”：

启者：敝公司此次因欲拯救女界诸病起见，日本医界泰斗医学博士绪方先生将数载经验见闻丰富妇女患病之起原，症候之变化及一切治疗法，无论何人，容易知其底蕴，编译汉文成书一册。天下有妻妾子女因病困苦之人者，不取分文奉送。倘蒙需阅此良书，请向上海河南路工部局隔壁东亚公司药书局取阅可也。如在外埠，将邮票二分封在信封内，即当奉送不误。¹³

当时报刊上登载的其他生殖医学书籍的广告词还有很多，如《男女婚姻卫生学》、《男女婚姻进化新论》、《婚姻进化论》、《普通男女交合造化机新论》、《传种改良问答》、

10 《中外日报》1902 年 6 月 21 日，论前广告第一版。此《吾妻镜》非日本古代史书《吾妻镜》，关于日本古代史书《吾妻镜》，可参看冯佐哲、王晓秋：《〈吾妻镜〉与〈吾妻镜补〉》，收入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编：《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08-217 页。

11 这类书中是否附有插图，对某些读者来说，意义颇为重大。如叶瀚即曾致信给汪康年，“承代买各书，《全体通考》最切要，但无图（见来函小注），可诧，想是图与说单行离开。失图书即不全，何以须七元之价？西书无图，便为废物，似不值得，且缓之。然请代询是否原书阙图？抑系向无图者？（记前有图一本在书内，此定是不全。）如无图是原本未刊者，请照价作八五折即买之，以其中讲胎原最详，他书所无也。”见《汪康年师友书札》（3），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559 页。

12 《神州日报》1909 年 6 月 17 日，第一页。

13 《时报》1911 年 8 月 10 日，广告第二页。

《处女卫生论》、《男女下体病要鉴》、《男女之秘密》、《小儿养育法》、《育儿与卫生》、《育儿全书》、《育儿谈》、《胎内教育》、《幼儿教育法》、《竹氏产婆学》、《西医绘图保产理法》、《生殖器新书前后编》、《生殖器秘病书》、《生殖器新书》、《女子卫生学》、《婚姻指南》、《实用问答生殖器篇》、《男女生殖器新论》、《造化机新论》、《改良男女传种秘书》等书籍，均有广告词刊登在报刊上。而且有的书籍在不同报刊上所刊载的广告词还略有差异，如《中国日报》1904年3月15日曾刊出“新书公告”介绍《婚姻指南》一书，这里刊出的广告词就与1904年1月20日《中外日报》和1904年9月4日《时报》等报纸上的《婚姻指南》广告词略有不同。

纵览这些报刊上刊载的广告内容，可知此类书籍主要是来自日本（当然其中一些著作也是日本人译自欧美）的译述之作，其中不乏重复、抄袭之作，也有个别中国人结合有关新的生殖医学和卫生知识的新作。广告中一般都会将书籍的著译宗旨、著译者、价格、发售商、发售地甚至书籍大概内容等情况公布，以方便或诱导读者购阅。有时还能从广告词中看出其版次情况，如1910年3月17日《时报》刊登的广益书局和鸿文书局书籍广告——“最新最详之生殖器卫生书四种”，其中书目均表明是多次出版——第三版《男女之研究》、第四版《生殖器之研究》、第五版《男女之秘密》、第五版《最新女子卫生学》。

在当时，不仅《中外日报》，《新闻报》、《新民丛报》、《大陆报》、《外交报》、《时报》、《警钟日报》、《神州日报》、《南方报》、《申报》、《民吁日报》、《民立报》、《时事报》、《天铎报》等诸多报纸杂志上都刊载有这类书籍的广告，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日报》上也刊载有一些。可以断定，诸如此类的生殖医学书籍广告，在清末许多报刊上皆有登载，而且往往一个广告还是同时刊载在不同报刊上，而笔者只看到一百余种清末报刊，本文所引更是九牛一毛，实际上，绝对不是只有上述报刊上曾刊登过此类书籍的广告，¹⁴笔者没有看到的（包括只看到影印本没有看到原版的）或者某些已经失传的报章杂志上，都可能刊载过生殖医学书籍的广告。

根据笔者看到的这些生殖医学书籍的广告资料，及有关书籍内所附此类书籍的广告（如《胎内教育》、《婚姻指南》等书即附有此类书籍的广告、《金陵卖书记》、《汴梁卖书记》的附录均有此类书籍的广告）、当时保存下来的一些营业书目，¹⁵再结合《增

14 如《经世文潮》第4期（光绪二十九年六月望日[1903年8月8日]）的广告插页上就有新智社所作的《男女卫生新论》等书的广告。

15 在周振鹤先生编的《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2005年年版）里，也有个别此类书籍书目，如广智书局的书目里有《男女生殖器秘病书》（一角）书名（第558页），支那新书局书目里有《男女情交新论》（无定价）（第638页）。总体上看，《晚清营业书目》收录的此类书籍的书目数量很少，这可能主要是因为所收书目只是当时上海一小部分书局的部分书目，其总量比当时刊登在诸多报纸上的书目少很多，而且收入的书局数目也很少。据笔者初步统计，晚清上海书局至少有400个之多，它们所作书籍广告更是数不胜数，且多有书之简介。如蔡元培在《增版〈东西学书录〉序》里所言：“方今士气大动，争研新学，已译未印之书，存目报纸者已不可僂指数。自是以往，益将汗牛而未已。”见《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有关晚清上海书局数目及名录，可参看拙文《晚清上海书局名录》，见拙著《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附录。

版《东西学书录》》、《译书经眼录》，¹⁶以及后人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¹⁷估算清末此类生殖医学书籍主要出版有以下五十余种（有些可能是重复或修订版，也或由于不同出版商所起的书名不一样）（见下表），可能还会有漏网之鱼，但总体上的数量应该不会差别很大。

清末年间（1901—1911）出版的生殖医学书籍书目¹⁸

书名	作者或译者	出版或广告信息	定价	备注
《婚姻进化论》	瑞典裔里平著，日本藤根常吉编译		每部两册，四角	
《婚姻进化新论》#	瑞典裔里平著，日本藤根常吉编译，丁福同译，	译书局代印，上海文明书局编， 光绪癸卯（1903）三月版	一册四角	或为《婚姻进化论》的修订版
《生殖器新书》， 一名《婚姻之领港》	美霍立克著，仇蓉秋、王立才合译		前编，定价一元	
《生殖器新书前后编》	霍立克著、仇蓉秋、王立才合译，	嘉定日新书所洋装本	定价前编一元，后编七角	
《男女交合新论》	美法乌罗著，日本神田彦太郎、王立才编辑，忧亚子译		三角五分	
《妊娠论》	渡边光次著，出洋学生编译所编译，	癸卯五月再版	四角	
《传种改良问答》# 后还有《订正传种改良问答》	森田峻太郎著，没有列译（编）者名字	商务印书馆印，光绪二十七年（1901）第一次印本，	三角或二角半或二角	
《男女婚姻卫生学》， 一名《少年男女须知》*#	日本女医士松本安子著，诱民子译，	横滨启智书会版	七角	

16 两目录均被收入《近代译书目》。

17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本文所列举晚清出版各书，《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收录的很少，仅收录《男女生殖器秘病书》、《男女婚姻卫生学》、《处女卫生》、《男女育儿新法》等寥寥几种，以后曾在民国年间再版的此类书如《造化机新论》（第99页）、《小儿养育法》（第180页）也曾收录，但已注为在民国年份出版。当然，《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收录的部分书目笔者在广告中也没有看到。另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把《造化机新论》归为化学门类，也值得商榷。

18 之所以这里称呼此类书籍为“生殖医学”书籍，是因为当时这类书籍，不同的人会将之归入不同的类别。依照当时人的分类法，这些书籍有时被归入“生理”类，有时被归入“卫生”类，有时则两者兼有，有时也被归为“全体”类或“体学”类，有时被归为“医学”类或“博物”类，有时还被归为“性学”或“教育”类。对这类书，在当时并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分类标准，即使是在《增版《东西学书录》》及《译书经眼录》里也是如此，如《译书经眼录》即曾将医学、药品、方书归入“卫生学”（《近代译书目》第567页）。考虑到行文与研究的方便，笔者将之统一名为“生殖医学”这个门类。

《小儿养育法》*	渡边光次著，周家树译	无锡丁氏畴庐本	二角	
《男女育儿新法》*	日本中景龙之助著， 诱民子译	启智书会本	二角六分或二角 五分或一角五分	
《处女卫生》*	美来曼波斯撒利著， 日本北岛研三译，冯 沛重译	广智书局洋装本	洋装每本四角或 三角五分	
《处女卫生论》			三角五分	或即《处女卫生》
《无上快乐》			一角五分	
《男女交合无上之快乐》			四角	或即《无上快乐》
《戒淫养身男女种子 交合新论》			八角	
《日本小儿养育法》			二角	
《婚姻指南》，一名 《既婚未婚男女必读》#	美国荷历著，诱民子译	横滨启智书会印，癸卯十月初 一日发行	八角或九角	
《胎内教育》#	伊东琴次郎著，陈毅译，	广智书局印刷，光绪二十八年 七月发行	三角	
《葆精大论》#	王建善著	育材书塾排印本	五分	
《男女生殖器新论》			四角五分	
《男女之秘密》#	笔者所见版本署名为 美国医学博士霍克立 著，春梦楼主人译，	卫生研究社发行，1922年7月 订正四版。此版本应该为清末 版的再版本。	六角	此处的霍克立应 该即前述之霍立 克
《女子卫生学》		最新小说社	六角	
《普通妊娠论附小儿 养育法》			一元三角	估计是《妊娠论》 和《小儿养育法》 的合成本
《吾妻镜》#	杨凌霄著	杭州图书公司1901年版	二角五分	
《男女造化机论》			七角	
《造化机新论》	日本细野顺著	商务印书馆	二角半	或即《男女造化 机论》
《普通男女交合造化 机新论》	日本细野顺著	出洋学生编译所译，	五角	或即《男女造化 机论》
《男女卫生新论》， 一名《延寿得子法》			精工洋装一元七 角，常式洋装一元 五角	
《男女下体病要鉴》*	丸山万著，金柯译	上海《国民日报》社洋装本	四角五分	

		一册		
《男女情交》			洋一角五分	
《男女生殖器病秘书》*	日本山崎荣三郎著，浩然生译	广智书局	二角，亦标一角五分	或即《生殖器病秘书》
《男女生殖器病秘书附图》			二角半	或即《男女生殖器病秘书》的附图版
《男女交合秘诀》			五角	
《男女之研究》		震东学社	两册洋三角	
《实用问答生殖器篇》		上海群益书社		
《生殖器全书》	岸田寿雄著，朱曾善译			
《最新胎产研究书》	郭德裕著	昌明公司	八角	
《育儿全书》		新学会社	六角	
《生殖器之研究·男子之部·女子之部》			计四册，定价洋二元六角	
《育儿与卫生》	大桥又太郎著，徐勤业译		四角五分	
《改良男女传种秘书》		发明书社	每部二册，洋八角	
《生殖覃》	渡边光远著，华文祺、丁福保译	中西医学研究会版	六角	丁氏医学丛书之一
《产科学初步》*	伊庭秀荣著，丁福保译	医书总发行所	七角	丁氏医学丛书之一
《幼儿保育法》		中国图书公司	二角五分	
《产科新法》	刘廷桢译	上海排印本		
《育儿谈》	丁福保译述	文明书局版	四角	
《竹氏产婆学》	日本竹中成宪著，丁福保译	医学书局 1908 年版	洋装六角	收入丁氏医学丛书
《子之有无法》*	田村化山郎著，丁福保译	上海医学	三角	
《全体通考》	英医德贞著		五元	
《产科》	英密尔著	江南制造总局 1905 年版		
《妇科》	美汤麦斯著，舒高第、郑昌棣译	江南制造总局版		
《育儿新法》	朱润深译	商务印书馆	二角五分	据《近百年来中译西书目录》第 86 页

《生殖器病学》*	佐藤进著, 李祥麟译	东京版	五角	
《胎生学》*	大泽岳太郎著, 丁福保译	上海版	一元	
《妊娠生理学》*	今渊恒寿著, 华文祺、 丁福保译	上海版	七角	
《妇女卫生学白话》*	山根正次著, 吴启、 孙节译			
《生殖器病学》*	佐藤进著, 李祥麟译	东京版		
《新婴儿科学》*	伊藤龟治郎著, 丁福保译	上海医学	一元二角	
《妇人卫生书》	日本绪方著	东亚公司书药局	赠送	见《时报》1911 年8月10日

注：表中书名后加*表示的是《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已收录书籍；表中书名后加#的表示作者看到了该书。

由上表可知，像表中所列《婚姻进化论》（《婚姻进化新论》）、《男女交合新论》、《妊娠论》、《传种改良问答》（《订正传种改良问答》）、《胎内教育》、《男女之秘密》、《普通男女交合造化机新论》、《生殖器全书》、《育儿与卫生》、《妇人卫生书》、《竹氏产婆学》等十一种书都是《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包括《近百年来中译西书目》在内所未收的（日本译自欧美的书籍、中国又翻译自日本的书籍也算在内）。表中其他未有列出著译者的书籍，也应该有一部分是译自日本的，姑俟以后有条件时查证。

根据当时如此之多、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广告来看，这五十余种书籍大都是由清末著名书局出版、经销，它们在当时书籍市场上的流通是比较广泛的，应该有许多的读者。也许正因为太多，司空见惯，习焉不察，倒没有多少人注意保存了。当然，或许是因为其“诲淫”，图书馆最初的工作人员不愿意收录，所以许多书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笔者多方搜求，只看到其中寥寥的七种。当然，不止是此类书籍流传稀少，就是清末的其他译著，相比其产生时的数量，历经劫乱，保存到现在的也已无多。

上表中的一些书籍在民国时期可能还重版过，除了《男女之秘密》外，《男女卫生新论》也可能再版过，因为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卷里所收书目，其中就有卫生研究社著的《男女婚姻卫生宝鉴》，标为民国十一年十月再版，又说该书“卷首书名为《家庭必备男女婚姻卫生宝鉴》”，根据这些情况来推测，该书很可能就是清末版的《男女婚姻卫生学》的再版本。而类似介绍性及养育、卫生等方面的书，在民国时期更是大量地出现。¹⁹这无疑是延续了清末以来这类书籍出版的热潮。

这些生殖医学书籍除在上海比较容易购买外，内地读者可以靠邮寄的手段得到这些书籍，也可以直接去当地书店购买。因为当地许多书店都代销这些书籍，如《生殖器新书前后编》一书的广告词中所显示，该书除上海外的销售处至少有十三个：苏州知新书室、南京明达书局、启新书局、山西机器印书局、河南时中书社、江西广智书

¹⁹ 有关此类书籍的书目可参看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卷，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77-388 页。当然该书目亦有不少遗漏，但大体上可反映民国时期出版的此类书籍之概况。

庄、安庆藏书楼、扬州华瀛公社、常州修学社、杭州总派报处、广州圣教书楼、湖州耶稣教堂、北京有正书局。²⁰像开明书店在去南京、开封赶“考市”卖书时都带有许多生殖医学书籍（详后），在两地卖书的情况也被记载和出版——《金陵卖书记》²¹、《汴梁卖书记》²²，两书后且分别附有“开明书店出版新书目录”和“开明书店新书目录”，其中就有这类生殖医学书籍的书目，不过这些书目都是在《中外日报》和《新闻报》曾作过广告的书籍。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广告里的标榜不一定就意味着其实质内容合乎这些标榜，广告中的宣传一般都要哗众取宠，往往会对商品自身进行放大或误导。清末报刊上的书籍广告同样存在如此情形。在以上所列举的五十余种生殖医学书目中，笔者只看到七种（《保精大论》只看到序），这七种书籍都有广告词公开刊登，结合这七本书的广告词与书籍内容，笔者认为这些生殖医学书籍的广告在某种程度上尽管误导了读者，也夸大了书籍本身的效用，但基本上还是表达了其著述意图，这在《吾妻镜》一书中尤其明显。²³又如《婚姻指南》一书的《译者自序》也宣称，其译作此“最有益良书”的目的在于公诸同好，传播发源于19世纪欧美的生殖医学知识，“欲普令世中男女得知生殖器之组织、职能、作用，明其生理，知其厉害。”²⁴且能为国人渐趋文明做些贡献，“今特译之以为普通教育之助。”译者“诱民子”还为生殖医学辩护道：

婚姻之目的，虽非尽在于交媾，然舍交媾不足以完婚姻之目的，交媾之为神圣事业也，明矣！夫文明之世，知事物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君子所羞也。生殖器为体中第一重要机关，自有人类以来，世世营生殖之作用，讫今日犹不知其所以然之理。19世纪之中叶，斯学始仅得发一缕之曙光，亦文明世之一惭色也。²⁵

《男女之秘密》的译者“春梦楼主人”亦与“诱民子”有着类似的说明，而更为大胆和直言不讳，直接指出，人间之世界，实色情之世界，色情对于人必不可少，并点出译者翻译该书的“重大目的”：

男女秘密者，不外乎色情二字，色情二字，虽秘密而其实并非秘密。质言之，人人尽有之秘密也。盖人间之世界，实色情之世界也，如无色情，则人将绝种，又安能有此绚烂华美之社会哉！然则在此绚烂华美社会上之男女，既知色情为人生必不可少之事，则又岂可不研究之乎？当世界未开通时，皆讳言色情二字，以色情为羞耻之事，而不肯公然告人。殊不知，男女之交接，初非徒为快乐主义，在重大之目的在焉。若只取快乐为主义，与禽兽虫鱼何以异乎？重大之目的何在？曰在生殖，而卫生之观念与道义之观念亦与焉！本

20 “开明书店十月份出版新书”，《中外日报》1902年11月22日，论前广告第二版。

21 上海开明书店1902年铅印本。

22 上海开明书店1903年铅印本。

23 有关该书的内容及时人对之的阅读情况，可参看拙文《另类的论述——杨蕞〈吾妻镜〉简介》，《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5期，2007年12月，第195-210页。

24 《婚姻指南》，第1页。

25 《婚姻指南》，第1-2页。

书以生殖卫生之说明为重，存男女之正理，而以种种不卫生、不道德之弊害为切戒，俾世间男女，因本书之解释，而知男女之真面、真义务，则本书之效著矣！

《婚姻进化新论》之《绪言》的译者借日本译者之口亦劈头即称，人之六欲即使是圣人也难无，“其中之最足动人而最较轻绝者，则莫如色情。”²⁶在《男女婚姻卫生学》起首，译者也认为，“人生第一大幸福”，“莫过于得好婚姻、生育强健宁馨之子，此实为世界中凡百乐事之大本。”²⁷该书在内容上与《男女之秘密》非常相近。

相比于《婚姻指南》、《男女之秘密》、《男女婚姻卫生学》等书的译者旨趣，《传种改良问答》的编者《弁言》则鲜明表示其批判性：

黄种人之劣败，种种无耻可痛，尤足悲悼。日本之稍能自立，与支那国人之全无心肝者，姑皆勿论。第论在美洲者，所谓中国街，其秽恶悉仍上海城内之风，其人皆长拖发辫，扬扬自得，全不知教育改良等事。

《胎内教育》的译者陈毅《序》起始也言：“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天理哉！天理哉！”直接表达其书之关怀所在。该序追溯以往中国人种之兴衰存亡史，指出当前面临的现实形势——“今日我国之弱极矣，外旅之逼甚矣！”痛陈当时中国人身体衰弱的现状及讲求生殖医学的重要性：

体魄者，德慧术智之母，而竞争之利器也。体已弱矣，虽有德慧术智，犹未能必其制胜也，况乎其德其智又不如人也。呜呼！黄白两种人最后之胜负，虽未可知，然而今日则我固着着失败矣！岂天之薄我耶，毋亦自陷于劣败之结果耶。且夫爱种者，动物界之公例也，种弱而强之，种劣而优之，尽我人事，制彼天行，于以光大乃祖乃父之声名，以自立于民族竞争之世界，斯真所谓天下兴亡，匹夫匹妇均有责焉者哉！若是则进种法理之研究，何可缓矣！

王建善在其所译的《生殖器新书》《序》中也标榜：

泰西生学家谓：“种下者多子，而子夭；种贵者少子，而子寿。是以蚊蚋虫鱼，皆系多子之物，不足贵也；虎豹犀象，生子不多，然所生之子，鲜见夭死。推之人类，亦有然矣。”余初闻是言，未之敢信，继而体察我国之人，大抵羸弱者多，强壮者少。乃知人多之洵不足恃，而早夭之大可寒心也。夫我国人之身多羸弱，无待远徵，士子年未二十，患梦遗等病者什八九，此羸弱之证也。夫国之精华在士，士之学术在身，故欲强其国，先强其人，欲强其人，先强其身。士既羸弱如此，则宜乎外侮日多。²⁸

这里，王建善直接将中国遭遇外侮的原因归为士人身体之羸弱，并认同“泰西生学家”（这个“名家”或许是出自王之杜撰，以增加其论说的“符号”威力）将个别动物的繁殖现象或某些学科知识普遍化并推广于人类社会的现象，其荒唐之处自毋庸置疑。不过，这却是当时诸多趋新人士比较普遍的做法。

26 藤根常吉：《婚姻进化新论》，第1页。

27 《男女婚姻卫生学》，第1页。

28 转见《保精大论》附录，无页码。

《胎内教育》还劈头即讨论教育对于国家、国民的必要性，指出：富强之术，盖在教育耳。²⁹之后该书谈胎前教育之必要：“胎内教育所以重要者，在养成健康强壮而富于活动性之婴儿也。”³⁰而“健全婴儿”为“国家百年之重宝也，强盛日本国之根本也。”该书还涉及胎前教育的注意事项，父母的义务，结婚前的注意事项，早婚弊害，父母遗传对于婴儿的影响，怀胎后的注意事项，产后的注意事项以及喂养婴儿的办法，如何教养，等等。这些论述虽然是针对日本情况所发，可对于急于强种、强国的中国人来说，自然“于我心有戚戚焉”。

《婚姻进化新论》一书则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起始讨论婚姻制度的演变情况、一夫一妻制的推行，也涉及情欲对于身体的影响、避孕之法及其对于女子身体的影响，兼论人口繁殖过快的害处、近亲结婚的坏处等等。书中指出婚姻制度实际与各地男女比例大小有关，女子数量多于男子，则可能采取一夫多妻制，反之亦然，“婚姻之制，虽有种种，要以一夫一妻为最自然。”³¹适当的情欲对于夫妻双方都有益，社会不当禁止，但对于色情书籍的害处，读者还是应该警惕。该书还指出血族（近亲）结婚，不仅于道德上不允许，而且其害及于子孙：

其儿童罹于腺病、精神病、肺病、畸形、白痴、聋哑等，以及体质薄弱之诸病者，比比而然，不得较出产于他族结婚者，得确认其健康也。³²

又特别点出父母酗酒也影响到后代身心健康，提醒读者早婚有害。对于女性，堕胎也应该尽量避免，因为：

堕胎之习，不特于道德上为大罪，并甚害于卫生。人无不好生而恶死，一经痛减，沉迷或悟。盖堕胎者，甚损其母体也，无有不受毒而得堕者也。³³

书中还点出人口生殖过多的害处。中篇讨论男女生殖器构造、生理，以及社会调查数据包括月经、结婚年龄等。下篇主要讨论情欲过度的危害、手淫危害，卖淫问题对社会的影响，花柳病发生的原因、表现等方面的内容。其他如《婚姻指南》、《传种改良问答》，包括《男女之秘密》诸书，都有类似鼓吹，一般侧重于生育、情欲、婚姻、妊娠与怀胎、养育小儿方面的知识。

在笔者所读到的这七种书中，大概只有《保精大论》更多是一本体现男权意识与房中术的著作，其他书籍的内容都延续了传统中医关于胎教、养生等问题的看法。毕竟，根据“日新医学及卫生原理”³⁴的此类书中，包含着大量的健康生殖观念与措施，符合后世新医学的内在要求与社会上的“文明”潮流，且迥然有别于传统的婚姻观、伦理观、妇女观、医疗观，自然会给国人以“启蒙”作用。无怪乎会引起当时读者包括一些新学书目编者的“戚戚之心”。

总体上看，以上谈到的那些翻译自日本的生殖医学书籍，反映的是明治维新后日

29 《胎内教育》，第1页。

30 《胎内教育》，第3页。

31 《婚姻进化新论》，第22页。

32 《婚姻进化新论》，第27页。

33 《婚姻进化新论》，第36页。

34 《婚姻进化新论·绪言》，第1页。

本国内的强种措施与思潮，针对的都是日本国民，援引的资料以日本为主，兼及中国，将欧美作为它山之石。正如《胎内教育》中所言，在西洋文明与武力的冲击下：

于是我日本之社会，状态一变，卫生上则有衣服、食物、住居之改良论，理学上则有文字改良论，摸效上则有演剧改良论。其远虑者，更恐人种湮灭于优胜劣败之战场，频倡与外人结婚、改良人种之说。³⁵

尽管这里表达的仅是日本的情况，但很明显，日本明治维新之时的举措是清末中国人追摩的榜样，曾为他们亦步亦趋的仿效。像《胎内教育》这里所指陈的日本情况，在清末中国也毫无例外地再发生了。当时所出版的这五十多种生殖医学书籍，不过是向日本学习中的一个方面而已。³⁶

三 生殖医学书籍的读者

以上这些生殖医学书籍中的部分书目，实际上早在康有为于戊戌变法时期写就的《日本书目志》里就有出现。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首先列举的就是“生理门”书目，共三十六类三百六十六种。³⁷在其中的“生理学通俗十一种”书目中，里面就有《造化妊娠论》（一册，四分，价格不知道是否是按中国大洋计算的，下同）、《造化机论》（一册，七分）、《订正增补造化机论》（一册，岩本吾一辑，三角五分）、《通俗男女造化机论》（小本）（一册，岩本吾一辑，八分）、《通俗生殖器论》（一册，长谷川竹叶译，七角五分）、《男女交合新论》（一册，桥爪贯一译，一角）等书目；在“卫生学三十八种”书目里，还有《妇人卫生（附育儿要诀）》（一册，大井谦吉译，三角）、《子育必携产育造化机论》（一册，浅利保正著，一角）、《男女交合论》（一册，六分）等。在这些书目后的按语里，康有为还认为“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其他相关书目还有“产科学”书目十一种、“产婆学五种”、“妇人科学五种”、“小儿科学四种”、“育儿法三种”等书目。

清末出版的这类生殖医书籍还进入了当时清末目录学家的法眼。如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宋树基、蔡光照、闵樾、黄熙合辑的《中外时务新书叙录》一书，³⁸其《卷十》就收录了《胎内教育》的《原叙》及《译者序》。

在徐维则辑、顾燮光补辑 1902 年出版的《增版〈东西学书录〉》里，也曾有徐维

35 《胎内教育》，第 2 页。

36 钟月岑（Yuehtsen Juliette Chung）的著作分析与比较了优生学在近代中日的发展情况和民国时期优生学的情况，但他这里并没有花费太多笔墨探讨优生学在晚清中国的情况，以及其与日本的关系，也没有注意到本文讨论的这些生殖医学书籍。参看 Yuehtsen Juliette Chung, *Struggle for National Survival: Eugenics in Sino-Japanese Contexts, 1896-1945*,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2. 冯客则认为：民国时期关于性的现代性论述，不是“中国特色”与“西方化”思想的混杂产物，也不能被解释为是“传统的”文化价值余存在“现代的”科学思想下的改头换面。他这里也忽略了晚清的情况，参看 Frank Dikötter,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p. 12.

37 姜义华主编：《康有为全集》（第 3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83—621 页。

38 上海会文学社 1902 年版。

则——“徐补”的《男女交合新论》的按语：

《男女交合新论》一册，上海日清书馆印本，（美）法乌罗著，（日本）神田彦太郎、王立才编辑，忧亚子译。首论精神之爱，中论交合之要，终论妊娠之源。

其阐发制造儿女之法，可谓透辟。读此书，于强种改良之道，深为有益。³⁹

在《增版〈东西学书录〉》里，还收有光绪十五年（1899）博济医局刊本的《胎产举要》二卷，同时还收有《产科新法》、《儿科撮要》、《妇科精蕴图说》等书。明显这些书是纯粹的医学著作，书录作者就事论事，并没有将对其的评点上升到强种、强国的高度。而且《增版〈东西学书录〉》所收这类生殖医学书目，其出版日期都早于1900年。

顾燮光编的《译书经眼录》虽然出版时间晚在1934年，其收集工作却早在1902年《增补东西学书录》出版前即已开始。顾燮光《自序》中亦谓延续的是《增补东西学书录》的工作，“仍踵徐书前例，著为《译书经眼录》。”⁴⁰由此可知，其中许多书籍，事实上早在清末就已经进入顾燮光视线之内。在《译书经眼录》《卷五·全体学第十四》中，依照“首全体，次心理，次生理”的顺序，顾燮光即收录了《造化机新论》一卷、《妊娠论》一卷、《胎内教育》一卷、《生殖器新书前后编》二册等“全体”类书籍，之后在“生理”目中，又收录了书目《男女育儿新法》一卷，在《卷六·卫生学第十六》中，有书目《处女卫生》一卷，在接下来的“方书”中又举出《男女生殖器病秘书》一卷、《男女下体病要鉴》一卷，各书且都加了版本介绍及内容衡评，这些评点也多强调此类书籍的“卫生”及“强种”的意义，如关于《妊娠论》的评点：

出洋学生编译。本书以制造妊娠为主义，详论生殖器之生理障害，以及孕胎结婚之合度，花柳病之预防，一切关于男女疾病卫生之事。凡二十三章，插图三十有九。盖传种为改良国民之基础，东西学者列为专门，固未可以海淫之书例之也。

另外，在《译书经眼录》卷八《本国人辑著书·生理第十七》中，还有一书目：“《葆精大论》一卷，王建善，育材书塾排印本。”从《译书经眼录》中所列举各书及对以上各书的版本、内容介绍来看，这些书目大都在报刊上刊登过广告，《译书经眼录》采用的版本也与当时这些书在报纸上刊登的书目广告版本是雷同的。再从顾燮光所作的对这些书的衡评来看，这些评论与当时报纸上刊载的这些书的广告词有颇多相似之处，很可能《译书经眼录》中的按语就是顾燮光根据报纸上刊登的相关书籍的广告词修改而成。

除去这些目录学家，这类生殖医学书籍被其他读者阅读的情况，在当时的新小说中就有所折射。李伯元的《文明小史》（连载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绣像小说》上）里曾有一些刻画，其中言及苏州趋新人士姚文通正在上海为儿子物色新学堂就读，突然接到家信，知道夫人临产，就急忙要赶回家：

临走的时候，又特地到书坊里，买了几部新出的什么《传种改良新法》、《育

39 《近代译书目》，第233页。

40 《译书经眼录·自序》，《近代译书目》，第401页。

儿与卫生》等书籍，带了回去，以作指南之助，免为庸医所误。⁴¹

讽刺小说《最新女界鬼域记》中说得更详细，作者假借“徐鹏飞”之口，说《男女新交合论》（实际影射的是《男女交合新论》）一书，书中插画“六七幅精图，钩深索隐，摹写逼真，一发大堪捧腹，”该书“从出版至今，海内外新旧两派一体特别欢迎，算来此书的价值，比教科书要隆重些咧。莫说别处，便是眼前租界上，几位有名望的美男秀女，那个不人手一书呢。”⁴²作者这里意在讽刺当时幼稚肤浅的女学生见“新”就崇拜的恶习，“脑部里头，舍‘新’字外再没藏得点墨。”⁴³从其叙述中，我们可以推知《男女交合新论》这类生殖医学书籍在当时的流行情况。以上虽是小说家言，不能全然相信，但“足以观人情而徵人心”，⁴⁴从中可透视一部分趋新士人阅读此类生殖医学书籍的情况以及对于“强种”的心态，也可于这部分生殖医学书籍在当时所激起的反应窥豹一斑。⁴⁵

实际上，清末有不少趋新人士都曾读到过这类书籍，像宋教仁 1905 年 1 月 19 日在日本也购买过《婚姻进化》（很可能就是《婚姻进化论》或《婚姻进化新论》）一书。⁴⁶再如郑孝胥，他在 1906 年 10 月 25 日拜访钱念劬夫人单士厘时，就曾留给他们《育儿简谈》二册。⁴⁷此处的《育儿简谈》一书，很可能就是第三章中提到的丁福保译述的《育儿谈》一书。可惜的是，他们的日记中并没有记录他们阅读后的感受。

值得惊喜的是，在《忘山庐日记》（上）里，孙宝瑄留下许多他购阅这些书的记载及评论，而他之所以在男女性问题上有许多迥越时流的见解，其原因也许正在于此。下面将《忘山庐日记》（上）里有关记载摘录如下：

十八日（1901 年 7 月 3 日），晴。昨午于雅叙园见黄益斋，持新译书一册，曰《男女交合新论》，美人法鸟罗著。询以售此书处，曰在第一楼后理文轩。余是日往购一部。⁴⁸

随后孙宝瑄在日记里叙述他阅读《男女交合新论》后的感受：

昨夕观《男女交合新论》，美人法鸟罗著。论制造子女之法，极奇。云：凡交媾结胎时，其父母偶怀一不善之念，则所生必凶恶之子。醉后媾合者，生子女为酒狂。故欲子女之聪明醇善者，必其父母之脑思心术，有过于人而后可，屡验而不爽矣。⁴⁹

41 李伯元：《文明小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9 页。引文标点略有更动。

42 蹉跎子：《最新女界鬼域记》，收入金成浦、启明主编：《私家秘藏小说百部》，远方出版社、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卷 80，第四回，第 25 页。

43 蹉跎子：《最新女界鬼域记》第四回，第 26 页。

44 钱锺书：《管锥编》（1），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271 页。

45 亦有人在报上撰文评论《男女交合新论》道：“自生殖器学发明，论者以发乎情、不必止乎礼义之交媾为女子当今之天职。”《汉口中西报》1908 年 3 月 7 日，“时评”，“新闻第一页”。

46 参看宋教仁《我之历史》，收入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511 页。

47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2 册），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1061 页。

48 《忘山庐日记》（上），第 362 页。

49 《忘山庐日记》（上），第 363 页。类似感想孙宝瑄在癸卯正月二日（1903 年 1 月 30 日）日记里又再次显示：“惟《交合新论》中所谓：当媾和时，善良之父，一念之私，遂生恶子；凶

孙宝瑄在日记里又记载了他购买的另外一些生殖医学类书籍的情况：

十三日（1901年8月26日），蚤，购得东文书数种，曰《普通妊娠法》，渡边光次著；《男女造化新论》，武藤忠夫著；《生植器》，美国佛栗智国著。⁵⁰

在十月三十日（1902年11月29日）日记里，孙宝瑄记载道：

夜，观剧，忽厌倦，遂闲步至第一楼品茶。买书二种：曰《吾妻镜》，曰《男女交合无上之快乐》。《吾妻镜》，通州杨凌霄著。凌霄与余旧相识也。其论人生三乐，与余不侔而合。又谓：凡欧洲自古大人物，强半野合而生。盖野合者，必两情相遂，故其种性精良，造成之人往往不凡。我国男女禁自择配偶，其交合皆用勉强，故种性不精良，而人才罕觐。国之不振，非一原因也。《男女交合无上之快乐》，日本人著，与《交合新论》略同。其中有云：男子精虫，为山中之金银，女子精卵，为海底之珠玉。皆至可宝者。颇有悟境。⁵¹

在十二月一日（1902年12月30日）日记里，孙宝瑄又记载他阅读《传种改良问答》后的感受：

一日，晴。观《传种改良问答》，日本森田峻太郎著。女子所以有月经者，因泡蛋长足时，其内必回触郁激，致子宫积血，内外口俱供肿，肿极而微丝管破裂，则经水行矣。此余所未闻，记之。又云：男女生殖器，其形状虽异，其构造殆同。取男阴翻转向内，即成女阴明之形；取女阴翻转向外，即成男阴之形。⁵²

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孙宝瑄又记下了他读《胎内教育》后的感想：

夜复观《胎内教育》，日本伊东琴次郎著。忘山居士曰：夫妇配合，宜由自择，欧人之风也。然与苟合有别，何也？盖当末结为夫妇之先，彼此先为朋友，必待二三年之久，互相察知性情之如何，品行之如何，以及身体之强弱，学问之优劣，无不体验周备，然后两情认许，再以父母造成之敏眼认可之，方能订盟结缡，至不易也。若夫苟合者，不过因一时之情欲，苟且而成婚姻，往往有后悔无及者。如《胎内教育》中所载，加曲那之贫妇是矣。见本书第七叶。是故婚姻之事，由父母压制而成者，固不可也；由两人一时之血气热情而成者，亦不可也。必半自择，半由父母，庶得中道。夫妇合性不合格，往往所举小儿多夭折，此泰西某国博士拍咸罗所考证之新理。希腊柏拉图氏曰：男女婚姻之期，男自二十五岁至三十岁，女二十岁以上，最为适宜。此与我国古制男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正合。天下美妇，不在貌，以强健完全为第一，此语吾信之。

三日，……观《胎内教育》终卷。⁵³

从上举记载可看出，孙宝瑄所购阅的这些书，都是在报刊上刊出过广告的书籍。孙宝瑄日记里更是有不少他读《新民丛报》、《中外日报》（即其日记里的《中外报》）、

暴之父，一念慈祥，遂生善儿。”《忘山庐日记》（上），第631—632页。

50 《忘山庐日记》（上），第384页。

51 《忘山庐日记》（上），第598页。

52 《忘山庐日记》（上），第611页。

53 《忘山庐日记》（上），第612页。

《新闻报》等报刊的记录。可以确定，孙宝瑄购阅书籍时会受到这些报刊上刊载的书籍广告的影响。而从他读了这些生殖医学书籍后的评论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孙宝瑄这样的读者应该最符合这类生殖医学书籍的著译目的及其广告词中所预设的那种类型。而潜藏在孙宝瑄阅读这些书籍背后的关怀，依旧是他关于中国种族问题的忧虑以及对改良传种问题的关注，期待中国人能和白种结合——“通种”，产生一个新种族，摆脱被列强轻视的“劣种”状态，像他在日记中所表露出的担心与希望：

吾始也谓黄种虽不能自立，亦不必灭亡。或与白种人媾和，另化出一种人在黄白之间者，亦未可知。今乃知其难。盖读观云《中国兴亡一问题》，内有云：优种人与劣种人结婚，往往能失优种人之性质。吾恐西人入我国后，有鉴于此，遂悬为厉禁，使黄白人不许为婚，则化种一说亦无望矣。虽然，我国人究不得全谓劣种，其聪明能力有突过西人者，或冀西人之不之禁也。⁵⁴

概言之，像孙宝瑄乃至徐维则、顾燮光等人对这些书的看法，当时可能不乏其人。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很多读者还是把这些书当作新鲜的“淫书”来阅读的。如《江苏》杂志上就有人言：“完全之卫生学书未见，若所谓《男女交际论》、《男女交合新论》者，则已数见不鲜。如是，不知卫生者，又将以卫生为诲淫之途矣。”⁵⁵该作者本意是要推广卫生观念，然从其言语中，可看出他是将《男女交际论》、《男女交合新论》之类书当作“诲淫”书的。⁵⁶

一些趋新人士确实也担心读者将此类书视作淫书而非卫生书来读的，上引徐维则补《男女交合新论》就言：世人每作淫书视之，则大谬也。⁵⁷顾燮光在上引各书的按语中也再三地表示：“本书无纤毫猥亵之谭”，“固未可以诲淫之书例之也”，“或以导淫书目之，误矣。”反复斯意，均足证明这类趋新人士的担心。而这些书籍在报刊上所作的广告亦每多如是言，如《男女卫生新论》的广告词中就言：“现今坊间所售之《交和论》、《妊娠论》、《生殖器论》诸书，不为诱惑淫奔之媒者，殆鲜矣！”⁵⁸《普通男女交合造化机新论》的广告词亦如是言之，“且莫以男女交合之名为邪书者。”⁵⁹《婚姻进化新论》书中也批评这类现象：

盖关于生殖及色欲之文书，坊间行之者甚多，然其说不特全反于道德上，且

54 《忘山庐日记》（上），第721页。

55 普澄：《卫生学概论》，《江苏》第3期，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闰五月一日（1903年6月25日），第80页。

56 日本福泽谕吉：《男女交际论》，张肇桐译，秦毓鎏校，文明书局，1903，每部大洋一角五分。该书到民国时期还不断重版，笔者看到其1922年版本的版权页上，已经列出“中华民国十一年一月五版”字样，只是定价改为洋一角，分售处成了“中华书局”，秦毓鎏的《后序》变成了前《序》，其他内容则与1903年版本相同。此书为翻译日本福泽谕吉的作品，加后序共24页，其主旨是主张男女平等交往，提倡女权，“革男尊女卑之恶习，养自由独立之精神”（第17页）。与生理学上的生殖和性稍有关系，但因书名有“男女”二字，且书中有涉及性之内容，易被时人认为是与《男女交合新论》一样的“诲淫”书。另外，《清议报》与《新民丛报》曾刊登过《男女交际论》的译文。

57 《增版〈东西学书录〉》，收入《近代译书目》，第233页。

58 《中外日报》1903年7月30日，论前广告第二版。

59 《新闻报》1902年5月16日，第一张。

绝无日新医学之原理，徒凭虚结想，饰为背理之言，以欺世人，实不过有害无益之书。⁶⁰

不过，出现这种情况也是理所当然，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肯定存在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在文本自身的内容就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情况下。即便是像《男女交际论》这样稍涉性之内容的书籍，其译者张肇桐、校订者秦毓鎏也有类似担心：

张君肇桐译《男女交际论》既竟，将付梓，深惧吾国顽固老儒冒此书为伤风败俗，又深惧吾国浮薄少年视此书为诲淫巧术，属予序之。⁶¹

上述这些人的担心并非多余，当时的确有不少人将这些生殖医学书籍当作“淫书”来观。李伯元在《文明小史》里即讥讽道：

翻译之事，将来虽然一定可以盛行，但是目下还在萌芽时代，有学问的书翻出来，恐怕人家不懂，反碍销路。现在所议的，乃是《男女交合大改良》、《传种新问题》两种，每种印三千部，出版之后，又买了两家新闻纸的告白，居然一月之间，便已销去大半。现在手里译着的，乃是《种子大成》。这三部书都是教人家养儿子的法子。⁶²

比起李伯元的讽刺态度，《新民丛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此类书籍的谴责态度可就严厉多了。在这篇名为《青年之堕落》的未署名文章里，作者严厉批评《吾妻镜》道：

顷见有恶少年某某两人著一书，题曰《吾妻镜》者。吾今为誓言于此，吾若无杀人之权则已，苟有此权，不杀著此书之人，传其首于十八省，非丈夫也。书局遍上海，新出书目告白，充斥报纸。而东西大哲之书，有关学术道德者，未见一部，惟见所谓《男女交合新论》、《男女婚姻指南》等书，不下数十百种。其书中岂无一二关于卫生、关于哲理者，然劝百讽一，其害人心固已不少，然犹曰其中有一二言卫生、言哲理者存也，何物梟獍，乃作此等明目张胆、诲淫诲盗之语。彼以是为言女权、以是为言平等、以是（原文为“最”）为言文明，彼岂知女权、平等、文明三字作何写法？以狗彘不食之败类，乃敢摇笔弄舌，以播其毒于血气未定之少年之脑中，若此等人不杀何待？不杀何待？此等之人、此等之书本，何足以污《新民丛报》之片纸。然吾深恫乎近日有新中国之新少年者，皆此类也。记曰：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盖有此等腐败社会，然后此等妖孽之人、妖孽之书出焉。见被发于伊川，知百年而为戎，吾安得不为中国前途恸也。吾为此评，于彼何损焉？彼之《吾妻镜》必骤多销万数千部，而彼花酒之费，又可阔数月矣。吾且恐艳羡彼二人而步其后尘者，将日出而未有已也，廉耻道丧，一至此极。国之亡也，复何慰焉？复何慰焉？⁶³

姑且不论该文中作者极端、武断、不宽容的思维方式，⁶⁴就以其所指陈之诸事来论，

60 《婚姻进化新论》，13-14页。

61 秦毓鎏：《后序》，收入《男女交际论》，第4页。

62 李伯元：《文明小史》，第108页。

63 《青年之堕落》，《新民丛报》第25号，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四日（1903年2月11日），第78-79页。

64 该文的偏激态度后来曾引起“公人”的反驳：“彼著《吾妻镜》之二人，为之主者，年已三十

就有许多不实之处，如该文说这类书“不下数十百种”，就为夸大之词；至于“东西大哲之书，有关学术道德者，未见一部”的判断，更是武断之论。想来写作该文之人作为《新民丛报》的作者，《新民丛报》上刊登的诸多这类书籍的广告和文章他不会一无所见，《新民丛报》支店代售诸如《婚姻指南》等书的情况他也不会一无所知，但他却故意夸大其词，甚至是用语言暴力来突出他对《吾妻镜》一书的深恶痛绝，同孙宝瑄对《吾妻镜》的态度适成鲜明对比。

与上述《新民丛报》上这位作者的立场相比，有人表达了稍平和的看法，《新世界小说月报》第6、7期（1907年）合刊有一文《读新小说法》⁶⁵，认为书的内容如何不重要，关键在于读者是否会读书。该文其中有云，对于善于读书的人来言，“《美人手》可读，即荒唐如《吾妻镜》，亦何尝不可读？”⁶⁶对于不善于读书的人来说，“微特《吾妻镜》不可读，即孟德斯鸠之哲理、斯宾塞尔之学说，亦何尝可读？”对于许多译著这类书的人，该文揭露其实质言：

无非托西籍以欺人，博花酒之浪费：连篇累牍，不外伯爵夫人、男爵夫人之头衔；倒篋倾筐，不外《男女交合》、《婚姻指南》之生活。

这说法正与前引《青年之堕落》文中的观点类似，该作者也认为此类书中包含的内容并非全无道理、全无必要，问题的关键是，这类书籍的译者不过是借“生理”或“卫生”之名，挂羊头卖狗肉，其目的并非是为了推广生殖医学的知识和为了种族的强盛，往往只是一种商业操作，是在迎合社会上正在提倡的“强种”风气，借用这个易得的“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去欺诱读者入彀罢了。接着该文作者似若有所指批评道：“何物恶学究，演而为才子佳人、状元伯爵，一味引火导欲、诲盗诲淫诸恶骂，唯不善读新旧小说故。”类似意思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里也表达过，“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书也，以旧眼读新书，新书亦旧书也。”⁶⁷以《读新小说法》之文推言之，之所以《青年之堕落》一文作者对《吾妻镜》加以严辞峻色，则正是因为担心读者“以旧眼读新书”，不善读此类生殖医学类书籍，舍本逐末，从而造成实际上是“诲淫”的结果。就是前引《最新女界鬼域记》小说里比较趋新也比较知新的“徐鹏飞”，虽然他也认为类似《男女新交合论》这种书，“倘若研究起生理学来，还可当他参考书用用

余，生平好奇，有僻见。盖其脑质，已铸成矣。学日文日语，已三年余，非若仅读和文汉读法而操笔者；遍学欧美物质上学问，而无一卒业。然其制作程度，在日本高等学校上，心不可谓不热，而识不足以济之，故为事往往失当，所见往往过度，所语往往过偏。惜乎生于三十年前，无教育以济其才。若为附者，年不过十余，其脑质之聪灵、学术之猛进，蔚然异日之大人物。我敢言之，且不徒富于思想，而兼有记臆力者也，《吾妻镜》即销数万千部，彼不得一钱。吾观中国青年，持道德心如彼者盖眇。非夸语也，他日出现于世界，观之可知。中国之新民，誓有权杀此二人，毋乃过乎？某非党彼二人，为之讼冤，公言也，幸察之。”公人：《与〈新民丛报〉记者书》，《新民丛报》第29号，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1903年4月11日），第103-104页。

65 转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3—279页。

66 《美人手》为连载在《新民丛报》上的翻译小说，后出单行本，常被归入鸳鸯蝴蝶派之内。

67 《忘山庐日记》（上），第526页。

咧。”⁶⁸但从其对购买该书的他的女学生吞吞吐吐的讳言态度看，他似乎也不认为女学生该读这种书。

由上可知，像孙宝瑄那样将这类书作为新学理接受的，应该属于比较少的案例，绝大多数读者还是因猎奇心态或赶时髦将其作“淫书”来购买或阅读的，这种情况是由时代的“心态气候”（mental climate）所决定的，以当时普遍盛行的关于两性关系的规范以及一般人的认知程度，这些书在当时的环境下被大多数人当作“淫书”来对待是不可避免的，就算延续到民国年间的上海，这种情况也没有多大改观。此类书在销售时遇到的情况也说明了这点。

开明书店主人公奴（夏颂莱）于1902年赴金陵赶考兼卖新书，归来后写下《金陵卖书记》一书，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他卖书时的一些情况，在谈及卖生理学书时曰：

生理学诸书以《婚姻卫生学》为最销畅。讲此等书者，其意见盖有三等，而确知其所当知之故者，盖无有也。最下者视之若淫书，一见其图，喜跃不自己，然惟恐人之见之也，故来讲必以幕夜，避师友，屏群从，伺人少时，以支身来。其择取之也，指以手，而口不敢道也。稍高者则目之为闲书，意若谓可有可无，取以销永日耳。其上也者，则视为医书，意若谓医者所当知也，然即非医者，亦不可不知。固彼所未敢信也，即非医者，亦无庸讳言，又彼所未肯许也。⁶⁹根据夏颂莱入木三分的刻画，我们可以想见这类生殖医学书籍在金陵“考市”的热销场景，自然也不难想像购买此类书籍的读者的心态！

1903年去汴梁赶“考市”的开明书店股东王维泰甚至把此类书籍视为可居的奇货，将之当成压箱底书来劝诱赶考士子购买，可惜许多士子似乎不明白这些书籍的要领，只认为是诲淫的“游戏之作”，未免让王维泰失望。他在《汴梁卖书记》中记载道：

所带生理科书有《妊娠论》、《交和论》及《医科生殖器图》，颇精致。凡客来阅书数十种，尚未得要领者即速出以上书，举图示之，则皆骇笑，视为游戏之作。及告以生理科学及东西各校医科列入大学之义，则容稍庄。更有不耻下问者，或竟购之去，兼及他书。有一客指“交合”二字，以此命名，太不雅。因诘之曰：男女媾精，圣经不讳，试校雅俗如何？客首肯曰：领教，领教！⁷⁰

据蒋梦麟的回忆，当清末革命党人在上海福州路（四马路）茶馆兜售革命书籍时，也曾借卖“淫书”作为掩护。其中一位号称“野鸡大王”徐敬吾的人，“他专门贩卖革命书刊给学生，他的货色当中还包括一本《性学新论》的小册子，据他解释，那只是用来吸引读者的。”⁷¹蒋这里的回忆，其个别细节可能不太准确，如他这里提到的《性学新论》一书，很可能是当时出版的《男女交合新论》一书，从中看出，不管是蒋梦麟，或是那位“野鸡大王”，或是在福州路茶馆里购书的学生，都是将“《性学新论》”作为“淫书”来看待的。安徽芜湖一个书店进行的关于卖书情况的调查也证实了这点：

68 《最新女界鬼域记》第四回，第25页。

69 公奴：《金陵卖书记》，第9—10页。

70 王维泰：《汴梁卖书记》，第6—7页。

71 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68页。

因为他们所买的书，据我们的卖书表比较起来，总不外那历史、地理、小说、卫生等书。历史、地理是科场里要用的，所以不得不买几部，预备进场的涉猎；小说是拿来消闲；至若卫生的书，不过是看见《男女交合新论》、《处女卫生》、《传种改良问答》那些名目，以为稀罕得很，当作淫书、春宫图看看，并不晓得卫生里实在的道理。⁷²

上引《金陵卖书记》文也可作为这段话的佐证。

换言之，站在读者立场来说，阅读本就是一个创造性的行为，读者不必也无须完全受制于文本作者或书籍出版者的意愿。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文本之真实意义为何是由读者所赋予的，由读者的阅读行动造成的。在某些情况下，读者的阅读反应与趋新人士对这类生殖医学书之读者的期待，可能存有契合之处，更多还是方枘圆凿、南辕北辙。

事实上，像清末出版的《男女之秘密》、《男女交合新论》之类书，或许青年鲁迅当时也曾经读过或知道此类书籍。因为时隔二十年后，鲁迅还曾在《朝花夕拾·后记》里提到过两本这样的书籍。事情源于鲁迅挖苦上海的书店翻印《百孝图》宣扬旧伦理的虚伪，讥笑他们擅自在“书名的前后各添了两个字：《男女百孝图全传》”，不伦不类，鲁迅接着讽刺道：

至于人心，有几点确也似乎正在浇漓起来。自从《男女之秘密》、《男女交合新论》出现后，上海就很有些书名喜欢用“男女”二字冠首。现在是连“以正人心而厚风俗”的《百孝图》上也加上了。这大概为因不满于《百美新咏》而教孝的“会稽俞葆真兰浦”先生所不及料的罢。⁷³

由上引鲁迅之语可知，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这类书籍依然在文化市场上流行，如《男女之秘密》就在1922年重版，故此鲁迅在当时完全能够看到此类书籍。当然，笔者以为更可能的情况是，鲁迅在清末就知道或阅读过此类书籍，因为《男女之秘密》、《男女交合新论》之类书最早是出现在清末的书籍市场上的，此类书的原本一般也是来自日本，那时20多岁留学日本学医的鲁迅应该是躬逢其会的。不过，对于学过医学的鲁迅来说，这类书籍与其说是生理卫生书籍，还不如说是“淫书”，尤其是就绝大多数人对之的购阅情况来看。

与前引《朝花夕拾》文一样，作家茅盾也在写于1929年的小说《虹》中提到了这类书。《虹》中写到柳遇春为了讨梅女士的欢心，知道她喜看新书，就常常买些书籍给梅女士：

凡是带着一个“新”字的书籍杂志，他都买了来；因此，《卫生新论》，《棒球新法》，甚至《男女交合新论》之类，也都夹在《新青年》、《新潮》的堆里。往往使梅女士抿着嘴笑个不住。⁷⁴

72 科学图书社社员：《调查》，《安徽俗话报》第14期（甲辰年九月十五日[1904年10月23日]），人民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第24页。

73 鲁迅：《朝花夕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9、80页。

74 茅盾：《虹》，《茅盾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7页。

茅盾这里的叙述，也可印证鲁迅前文的叙述，说明茅盾、鲁迅两人当年都曾知道或阅读过此类书籍，也说明这些书籍在民国时期的文化市场上仍是比较盛行，几乎还是被当作“淫书”来看待的。

当然，也有不同于上述读者将这些生殖医学书籍当作新学理或淫书的观点，近代湖南著名学者叶德辉的看法就是一例。叶德辉曾编有《双梅景闇丛书》，该丛书最早出版于光绪末年，出版后“轻薄少年争购之。”⁷⁵据后来研究过叶德辉的学者说，在叶德辉所印过的不少书中，“以这套坏书印销最多，获利最厚，其流毒也非常深远。”⁷⁶研究者是出于“政治正确”心态来评价叶德辉及其所编《双梅景闇丛书》的，自无足怪。但亦可看出《双梅景闇丛书》之所以销量大，正在于其是被作为“淫书”来购的。不过，叶德辉本人似乎并不这么认为，他在该书第一篇《新刊素女经·序》中振振有辞：

今远西言卫生学者，皆于饮食男女之故推究隐微，译出新书如《生殖器》、《男女交合新论》、《婚姻卫生学》，无知之夫诧为鸿宝。殊不知中国圣帝神君之胄，此学已讲求于四千年以前，即纬书所载《孔子闭房记》一书，世虽不传，可知其学之古。又如《春秋繁露》、《大戴礼》所言古人胎教之法，无非端性情、广似（应系“嗣”之误）续，以尽位育之功能。性学之精，岂后世理学迂儒所能窥其要眇？⁷⁷

从叶德辉语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这类翻译书籍的流行程度，曾被“无知之夫诧为鸿宝”。于焉也可知叶德辉认为新译的诸如《生殖器》、《男女交合新论》、《婚姻卫生学》等外来书，并不值得特别珍贵，结合中国过去的有关典籍，此类新译的学问中国实是“古已有之”——“此学已讲求于四千年以前”，时人不必数典忘祖。叶德辉这里的心态或属“西学中源”，也夸大了此学在中国存在的时间长度，不过，如果结合上述这些新译、新著生殖医学书籍的内容，我们发现叶德辉所言并非完全强词夺理。

四 结语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其名著《启蒙运动的生意》一书中曾指出，法国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既存在于哲学家的沉思中，也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正是凭借出版商的投资与长袖善舞，并依赖金钱和权力的结合，《百科全书》才成功进入法国社会，并越过法国国界，在欧洲产生极大影响，开创了一个启蒙与民族主义到来的时代。⁷⁸清末出版的这些生殖医学书籍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自然无法与《百科全书》对法国及欧洲的影响相提并论，但这些书籍亦有其重要作用和象征意义，同样是与商业运作纠缠在一起，依靠商家的包装、宣传、经销，成为时人新的知识资

75 李肖聃：《星庐笔记》，岳麓书社 1983 年版，第 31 页。

76 杜迈之、张承宗：《叶德辉评传》，岳麓书社 1986 年版，第 50 页。

77 叶德辉：《新刊素女经·序》，收入《双梅景闇丛书》，光绪癸卯嘉平月长沙叶氏刊，海南国际新闻中心 1998 年影印本，第 7—8 页。

78 参看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叶桐、顾杭译，三联书店 2005 年版。

源与文化政治操作资本，对当时的身体意识、种族论述、生殖观念与生育文化影响匪浅，开启了以后更大规模讨论的先河，五四时期兴起的“新性道德”，关注如婚姻制度、一夫多妻制、性与强种等等方面的内容，包括此时张竞生的许多主张；以后民国时期的节育运动、中国大陆当下的计划生育政策；类似表达都在清末出版的生殖医学书籍中有所揭橥和涉及。或可说，清末出版的这些生殖医学书籍，实际上是民国时期乃至今日“新性道德”论述的滥觞，它们还可能奠定了以后中国性医学、生殖医学研究的基础，自然值得相关问题的研究者重视。

饶是如此，不管这些生殖医学著译怎么样鼓吹其著译宗旨，怎么样在书后来揭示这种旨趣，它们也难逃这样一个悖论，像中国古代的“诲淫小说”一样，其内容尽管非常淫秽，自序仍会“十九以劝诫为藉口”，⁷⁹类似这样的修辞策略、叙述方式，与传统的所谓色情小说、房中书等非常相似。⁸⁰无怪乎出版此类书籍会遭遇到一些阻力，“自始译（《婚姻指南》）至今日，约有年余，其间排尽许多阻力，今仅得睹其成。”⁸¹

这些生殖医学书籍的出版受到杯葛，并非意味着其就没有被盗版。事实上，因这些生殖医学书籍在当时比较畅销，文化市场上存在不少这类书籍的盗版、割裂版，“对书商来说，最好的书就是能销售出去的书。”⁸²不管是谈革命的书，或是“淫书”，“但见某书广销，即贩来出售，以期获利。”⁸³由于当时这类生殖医学书籍销量大，获利比较容易，商家往往“五版尚没售罄，六版早经印就”，⁸⁴它们也成为盗版、翻印对象。即便如《婚姻指南》、《男女婚姻卫生学》这类书往往已经声明“书经存案，翻刻必究”、“是书（指《男女婚姻卫生学》）已由日本文部省存案，并照会中国官吏，严禁翻印，倘有擅敢翻印渔利者，定当追究也。”⁸⁵出版界自有其惟利是图的“潜规则”，还是有不法商家将旧译改头换面或重新割裂推出。如时人言：

一入坊市，则上焉者，古文诗选本、旧典说部翻刻，大雅扶轮高瞻远瞩，是所谓保存国粹者；下焉则诲盗诲淫之稗说——《官场现形》、《女界秘密》、《新金瓶梅》、《新痴婆子传》，犹不获已，更支离割截《男女卫生》、《交合》等书，改换标识，欺人攫货，窃卖淫国之续余，假借新名词以戕贼吾青年子弟，暗夺黄金可宝之光阴。嗟乎痛哉！⁸⁶

不过，此类生殖医学的盗版书、割裂书增多并不会妨碍其畅销，反倒会刺激读者的消费，加大其流行深度与影响力，使更多读者获得这些生殖医学知识。

79 钱锺书：《管锥编》（1），第110页；参看李梦生：《中国古代禁毁小说百话》（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80 这些书籍与传统房中书等在内容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其区别或在于这些生殖医学书籍吸纳了更多西方的知识资源，特别是其近代的科学与医学知识，其又挪用强种的招牌，使之较传统房中书不但具有更大的“合法性”，而且具有更大、更迫切的现实意义。

81 《婚姻指南》，第2页。

82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Cathy N. Davidson (ed.),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3.

83 《志查封书店事》，《中外日报》1905年3月13日，第二版。

84 蹉跎子：《最新女界鬼域记》，第三回，第20页。

85 “《男女婚姻卫生学》”，《中外日报》1902年5月31日，论前广告第二版。

86 指严：《论吾国之出版自由》，《时报》1911年3月16日，第一张。

简言之，清末文化市场上出版的这些生殖医学书籍，尽管难以逃脱“淫书”与商业操弄的嫌疑，亦难以避免被滥用的情况，但它们也鲜明体现了出版与文化政治的勾连情形，特别是时人关于身体、种族与国家的建构情况，这正表明晚清以来关于强种、现代性和民族国家的“文化想像”（cultural imagery）之勃兴态势，以及当时知识精英在心理上的危机程度与自强意识。更重要的是，这些书籍的出版还揭示了时人通过挪用来自西方的知识资源所进行的文化转换与抵抗，为了在中外竞争中胜出，他们希望通过强种论述和对身体、种族及国民的改造，来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这种文化政治操作透过报刊、杂志、小说、戏曲、校歌等媒介，扩散开来，变成当时中国人藉以认识危局、解释世界、改变现实的思想武器。

Publishing and Cultural Politics: The Late Qing Books on Reproductive Medicine and
Their Readership

Zhang Zhong-m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e Late Qing period saw many a national discourse fabricated by intellectuals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national strengthening and booming patriotism. The books on reproductive medicine of that time fit well in this framework, which received yet less than enough academic notice. In fact, the authors and publishers articulated their national and statal concerns, believing that practical ways of racial upgrading and eugenics were to be found in the west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sometimes via Japan. These books were of certain significance in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as they suggested the thirst for a powerful state and a prepotent nation haunting the modern Chinese mind; while illuminated the intertwin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shing and cultural politics. The whole link from the author, the publisher through the reader and its meaning deserve good scholarly thoughts.

Keywords: Publishing Advertisement,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 Books on Reproductive Medicine, Readership, Cultural Politics